

现代语文

高群 王家伦·主编

教育名家评传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现代语文教育名家评传

主 编 高 群 王家伦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语文教育名家评传/高群,王家伦主编.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5641-5264-2

I. ①现… II. ①高…②王… III. ①汉语—教育家—评传—中国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8393 号

本书由苏州大学重点学科经费资助出版

现代语文教育名家评传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南京星光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328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5264-2

定 价:48.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收集资料与撰稿人

(按音序排列)

陈春华	陈晓姿	高 群	刘腾腾
黄爱玲	江 跃	钱晓敏	权俊良
孙秀娟	陶秋萍	王家伦	汪晓娟
吴 阳	俞若英	张 悦	赵黎丽
赵龙泉	赵 莹		

现代语文教育名家评传

（前言）

清末，“癸卯学制”实施，现代语文这一门学科逐渐确立。在语文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及教学手段上，出现了不同于古代经史哲综合的“大语文”教育的全新格局。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现代语文教育名家，对现代语文学科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包括现代语文教育早期的开拓者：张百熙、黄遵宪、陈子褒；现代语文教育研究的先驱者：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鲁迅、刘半农和朱自清等；也包括现代语文教育的实践者和理论建构者：叶圣陶、夏丏尊、吴研因、穆济波、孙俚工、赵欲仁、周予同、于在春、霍懋征、刘国正、徐振维和张鸿苓等；还包括现代语文教育科学化、现代化的探索者：黎锦熙、陈望道、艾伟、孟宪承、阮真、叶苍岑、吕叔湘、朱绍禹和顾黄初等。因此，对现代语文教育名家作一详细的介绍，一则有助于更好地梳理过去的经验、探讨规律，二则为当下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或与语文教育相关人员树立模范，引得借鉴，为语文教育的深化发展贡献力量。

当然，这样的工作，更多的是一种资料重新编码、整理的工作，以便今后教学、研究的需要。

关于本书的体例

其一，当今流行的“现代语文教育史”，大多为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如需整体上了解一位语文教育名家，需前后翻阅检索，甚为不便。故循太史公之例，以纪传体形式编写是书。其二，传主每人一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少则一两千字，多则一两万字。一些涉及多人的事件不重复记载，以“参见”形式

互见。其三,每篇以“语文”为主线,简介该人生平;评介该人语文教育观和对语文学科建设的贡献;设“有关文献简介”专栏,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

关于本书的传主

其一,1904年“癸卯学制”后语文独立分为一科,期间几经周折,有志之士辛勤耕耘,兀兀穷年,致使语文教育渐成规模。期间名家辈出,故选择对现代语文教育(1904—2013)影响颇大者。其二,“生不立传”是史志传统之一,故本书选择对象为盖棺论定者。其三,有些对语文教育影响颇大者的有关材料难以搜寻,故只能选择自己“所知”的“有材料”的30余人为撰稿对象。今后有机会逐步补充。

关于本书的排序

按传主生年排序。

高 群

2013-12

目 录

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张百熙	/001
高瞻远瞩,谦虚好学——黄遵宪	/006
东方的裴斯泰洛齐——陈子褒	/013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	/019
系统语文教学法的开创者——梁启超	/026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	/032
杰出的平民教育家——徐特立	/036
见解独到,卓尔不群——鲁 迅	/045
平平淡淡才是真——夏丏尊	/052
孜孜以求,奋斗一生——吴研因	/060
不该被湮没者——穆济波	/063
语文教育科学的第一人——艾 伟	/067
语文建设的弄潮儿——陈望道	/075
现代语文教育学的奠基者——黎锦熙	/084
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刘半农	/090
学识渊博的审思者——胡 适	/098
严谨踏实,务实朴素——蒋伯潜	/107
多才多艺,善借他山之石——孙良工	/116
民众教育的实践者——孟宪承	/121
一代语文教育大家——叶圣陶	/124
致力于小学语文教育的研究者——赵欲仁	/146

母语教育必须尊重传统的经验——王森然	/149
首批语文教材教法研究生导师——阮 真	/154
完整的人格,真正的人师——朱自清	/162
远见卓识,一身正气——周予同	/178
语文教学应有法——叶苍岑	/181
民族语言的守望者——吕叔湘	/187
平淡质朴,凛然正气——于在春	/197
语文教育的一代通人——张志公	/207
把毕生的爱献给孩子们——霍懋征	/215
一生为了语文教育——朱绍禹	/220
语文就是生活——刘国正	/227
忠实的实践者——徐振维	/231
起步于普通中学的学者——顾黄初	/238
当代语文教育改革的先驱——张鸿苓	/252
参考文献	/262
后记	/267

近代教育改革先驱

——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号潜斋,谥号文达,湖南长沙县人。清末大臣,近代教育改革先驱者,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他一生热心教育事业,积极投身教育改革。曾担任清末管学大臣,主管全国学务,其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近代教育有开创之功。

一、生平简介

(一) 生平经历

张百熙出生于一个并不富裕的书香家庭。父亲名启鹏,是道光乙未的举人,做过总督裕泰将军的幕僚,后隐退,从事儒学研究,著有《自言约编》。曾先后在安陆、澄阳、洙江、石鼓等书院讲学,并任主讲,还创作了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歌。张百熙母亲早亡,但他经常与父兄在一起读书。在这种书香氛围的影响下,张百熙年幼时便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功底。少年时曾在湖南长沙妙高峰的城南书院读书,师从湖湘文化著名传人郭嵩焘,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工诗善书的特长使张百熙初入仕途就颇得圣眷。

张百熙沿着一个典型封建知识分子的道路步入仕途,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五年(1879年)任山东乡试副考官;光绪七年(1881年)任山东学政;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光绪十五年(1889年)命南书房行走;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加五品衔,赏戴花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历陈国事,反对主和。1897年任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次年奏保康有为应经济特科试,戊戌政变后革职留任。1900年任礼部侍郎,旋升左都御史。《辛丑条约》签订后,奏请变更科举,兴办学堂,设立报馆。嗣迁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充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又创办医学堂、译学馆、实业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后历任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病重,二月辞世。清廷“谕旨”:“邮传部尚

书张百熙，公清亮，学问闳通，兹闻溢逝，悼惜殊深。”追赠太子少保衔，谥号文达。张百熙的逝世，使许多开明官吏和知识界人士十分悲痛，纷纷撰联悼亡。^{〔1〕}其中林琴南挽联中有一句：“一江湘水动悲风”，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其逝世的悲恸情怀。

（二）涉足教育改革

张百熙在清廷为官三十余年，担任过许多重要官职，但张百熙最为突出的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他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张百熙入仕为官以来从事的教育活动比较多，其中对中国近代教育有重大影响的主要体现在重建京师大学堂和推进晚清学制改革两个方面。^{〔2〕}

1. 重建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时，光绪帝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九月政变发生，新政废止。但由于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主张在变法以前就有议论，所以京师大学堂并未封闭，只是逐渐有名无实。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京师大学堂也难逃厄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庚子之难后，清政府着手恢复京师大学堂，派张百熙总理其事。张百熙奉命以后，“悉心考察，夙夜构思”，他想尽各种办法筹措办学经费，加大学堂建设，重视师资，推进人事改革，倾其全力恢复和发展京师大学堂。

2. 推进晚清学制改革

20世纪初的中国危机四伏，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改革教育便是“新政”的重要内容。而制定新的具有近代特征的学制是教育改革的主要方面，张百熙负责拟定了“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清末学制的改革制订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承前启后之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虽然“壬寅学制”本身不够完备，“癸卯学制”也只是沿用至民国初年，但是20世纪初的这场教育改革，是中国自科举制以来最激烈的一场变革。教育从“养士”向培养专门人才转型，这是教育性质、目标的根本改变，是一场具有里程碑式的变革。而作为这场改革领导者之一的张百熙，他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他参与制定的两大学制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还在于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1〕 张倩. 张百熙与中国教育近代化[D]. 重庆: 西南大学, 2006

〔2〕 张普. 张百熙的教育思想及实践[D]. 湖南: 湘潭大学, 2009

二、对语文教育的探索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张百熙逐渐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给我们当下的语文教学带来有益启示：

1. 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近代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育理念。“中学”又称“旧学”，“西学”又称“新学”。所谓“中学”，主要指我国的“经学”和“中国文学”，这种“中学”，为晚清统治者所竭力维护。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继续维持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纲常名教的统治地位；所谓“西学为用”则是要向西方学习“新”的手段，就是在尊孔读经、坚守封建礼教的前提下，学习一点西方的语言文字、法制规章和自然科学知识，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壬寅—癸卯学制”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张百熙、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虽然倡导学习西方技艺，却以“中学”作为其前提，奉“中体西用”为圭臬，是“中体西用”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2. 废八股、停科举，实施学堂章程

发端于隋代的科举制度至清代已是流弊百出，开明官僚、士子已洞悉八股之弊，高官如张百熙，地方大吏如张之洞、袁世凯等多次奏请朝廷废止科举。作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多次“痛陈八股之弊”。1903年，张百熙会同荣庆、张之洞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张等在奏本中称“由于科举未停，天下皆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他们进而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张百熙等估计，只需十年科举中额将减尽；不过，废止科举的步伐比他们设想的要快得多。1905年，清廷正式下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这在客观上也促成了语文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1902年，张百熙拟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学制——“壬寅学制”，即《钦定学堂章程》。它是我国的近代学制的肇始，但并未施行。1904年，张百熙对学制重新厘定，奏准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称为“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实施的较为完整的近代学制，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学制。

在“癸卯学制”中有关语文教学的内容包括初等小学堂的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课，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当时字的认、写、讲、用

教学是分步实施的:字的认和讲基本是由读经讲经课承担;字的写和用或由字课、习字课、作文课,或由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课承担;“中国文字”,要求讲积字成句、积句成章之法,并练习以俗话作日用书信。应该说,这基本上还是沿用传统的识字教学方法。而中国文学承担四项任务:(1)阅读。全部读古文,但是对阅读的内容和篇数没有明确的规定。(2)作文。先要求在阅读的同时,教学立意遣词的方法,并用俗话翻译文言,后学作记事文和说理文。(3)习字。前习楷书,后习行书。(4)练习官话。每周一次,以《圣谕广训》直解为标准。在学科设置上,“中国文学”独立出现,第一次作为一门学科进入教育体制,它开启了历年的国文课、国语课和今天的语文课的先声,为“语文”学科的真正建立打下了基础。

三、有关文献简介

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包括《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蒙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包括《奏定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附通儒院章程》、《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奏定师范学堂通则》等。“壬寅学制”因制定过于急促,及本身若干不足和局限,加上清廷内部的权力角逐,未能付诸实行。后颁布的“癸卯学制”也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张百熙的开创之功,不容抹灭。“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制定与实施,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促使全国学制渐趋规范统一,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在这些学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百熙对国文教学的宗旨、内容和学习年限等都有明确要求。

张百熙的一生,跨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涉及了晚清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政治思想、教育主张等散见于他的奏折,现存的有《退思轩诗集》六卷,《补遗》一卷,这些资料成为研究张百熙生平及其思想的基本依据。^[1]目前,已有不少学术论文对张百熙的教育理念展开研究,主要涉及“张百熙的学制改革思想及其实践研究”、“张百熙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张百熙与晚清教育改革”、“张百熙论教师”、“张百熙德育思想新论”等方面。但是张

[1] 张倩.张百熙与中国教育近代化[D].重庆:西南大学,2006

百熙的语文教育理念还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

张百熙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在清末封建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他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及时接受外来先进教育文化理论的熏陶，提出系统的改革方案实属不易。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育革新的养料，推动我们当下的语文教学的改革。

高瞻远瞩,谦虚好学

——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省嘉应州人。他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放眼看世界,亲身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先进人物。他不但对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对西方现代教育也有深刻的理解。研究黄遵宪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对我们全面地了解黄遵宪,批判地继承我国的教育学遗产,都是不无裨益的。

一、生平简介

(一) 生平经历

黄遵宪的父亲黄鸿藻是举人,黄的曾祖母李氏和母亲吴氏,都出身于封建官僚或知识分子家庭,李氏是个民间文学的爱好者。黄遵宪从牙牙学语起就接受了最初的文学熏陶。

1867年(清同治六年),黄遵宪参加院试,入了州学,考了个秀才。1867年夏,黄遵宪前往广州参加乡试(考中了是举人),未中。1870年又往广州参加乡试,仍未中。他最终于清光绪二年(1876)在北京考取举人。1877—1894年先后任清政府驻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使馆参赞、领事等职。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黄遵宪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与欣喜,他对日本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持肯定态度。

1894年甲午之战,中国大败,帝国主义乘机掀起第二次割地狂潮,并且互认势力范围,“逐步瓜分大清帝国”。中国处于危急之时,黄遵宪从海外归来,立即投入变法维新运动,与康有为、梁启超组织强学会,捐资创办《时务报》,极力宣传改良变法的主张。

1897年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并署理湖南按察使,积极推行新政,扫除积弊。1898年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未赴任而戊戌变法失败,他因与康有为、

梁启超有牵连，于同年十月中旬遭革职返归故里，历时7年赋闲在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典籍，努力读书，并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上。起初是他亲自设堂授徒，并请外籍医生讲解生理学、解剖学等科学知识。进而是邀集地方人士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民，撰写《敬告同乡诸君子》书，呼吁办新学。

1905年，黄遵宪先生不幸病逝，终年58岁。生前自编出版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等。

（二）涉足教育界

1. 抨击科举制，反对旧教育

黄遵宪早年受封建主义传统教育的熏陶，崇尚儒家思想。但是到了青年时期，黄遵宪开始对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表示不满。1877年他出使日本后，思想更有所变化。他批判了中国封建士大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日本国志·凡例》），指出中国自秦汉以后，非“民贵君轻”，乃“君尊而民远”、“竭天下以奉一人”（《日本国志·食货志》）。

黄遵宪认为，古今社会不同，时势各异，人们说话办事应当适应于变化了的新形势，不必拘泥于古人的条条框框。他大声疾呼“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对于从古到今的各家思想学说，他从不随便言从附和。即使对于在封建社会中一向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他的这种思想愈到晚年愈见其坚，1902年，55岁的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在信中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不过九流之一，可议者尚多”。他很赞同梁启超对儒家学说的非难，认为“昌言排击之，无害也”，并且指出“孟子亦尚有可疑者”。清代自乾隆以后，在教育领域中科举制和八股文紧密地结合着，不仅给青年一代的思想戴上了可怕的镣铐，也给文化教育带来深重的灾难。对此，黄遵宪予以猛烈的抨击。^{〔1〕}

2. 重视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积极创办时务学堂

黄遵宪坚决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他迫切要求建立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尤其重视基础教育，即蒙学（幼儿教育）和中、小学教育。

他说：“吾以为所重在蒙学校、小学校、中学校；而彼辈弃而不讲，反重大学校。”（1902年5月《致梁启超书》）他极力主张普及小学教育。他写道：“鄙人环游海外，历十数年，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为尤重，

〔1〕 邹荣础，黄遵宪教育兴国思想探析[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2004（9）

名之曰普及教育,谓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也;又名之曰义务教育,谓乡之士大夫,族之尊长,各有教子弟之职,各负兴学之责也;又名之曰强迫教育,谓子弟既至学年,而不就学受教,施罚于其父兄也。”又说:“普及小学校,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敬告同乡诸君子》)在经历漫长封建科举的桎梏,致文盲众多、愚昧落后的中国社会,他以自己多年在国外所见,对小学教育的含义作出如此通俗的解释,有助于唤醒国人对它的重视,可谓一新天下人的耳目。关于小学教育的目的,黄遵宪认为必须把德育、智育和体育一齐抓好。他还提出必须开设图画、唱歌和工艺课程,即进行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黄遵宪不只从理论上阐述了有关基础教育的一些问题,而且还躬行实践。1903年他亲自发起并捐款在其老祖屋“荣禄第”创办“幼稚园”。

黄遵宪十分重视师范教育。他把师范生、教科书、地方场所和资金款项作为“兴办学务”的四个重要条件。他指出:“师范生非教育不能成,故鄙人之意,必须先开师范学堂。”(《敬告同乡诸君子》)他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曾记述日本“有师范学校,则所以培养成教员,明其广益者也”。在黄遵宪的积极倡导和亲自主持下,梅县地区终于在1904年办起了第一间师范学校——东山初级师范学堂。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始自1902年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的公布。据张謇《通州师范学校议》记载:“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可见黄遵宪倡办的东山初级师范学堂是我国最早的民办师范学校之一。

黄遵宪还十分关心成人业余教育,并就此提出过宝贵见解。他指出:“惟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老,无地向学,非特向隅,亦深惜其玩时而弃日,鄙人当拟设一学堂,名曰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又拟设一讲习会,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肄业,以期速成。”不久,黄遵宪又创立“嘉应犹兴会”,亲订章程,规定成人业余教育“以新学求切用,以专门定趋向,以分科求速效,以自治为精神之宗旨,集合成年人中的有志者按政治、修身、卫生、历史、算术、格致各科进行学习”。(《警钟日报》,1904年)黄遵宪对成人业余教育的关心和灼见,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黄遵宪为实现其维新变法思想,披荆斩棘,躬行实践,做了一番开创性的而又极其具体细致的组织领导工作。1897年他赴湖南任长宝盐法道职务前夕,与户部尚书、帝党领袖翁同龢和辞行畅谈国事时,曾建议当务之急有三,其首条是“开办学堂”。他抵湘到任后,同年十月,即与陈宝箴、熊希龄、谭嗣同等人于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他特聘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为时务学

堂中文总教习。翌年(1898)三月起,黄遵宪担任时务学堂总理。所有办学章程,讲授课程,皆由他参考东西方各国教育制度一手制订。^{〔1〕}时务学堂创办一年中,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一大批有作为的学者和教育家。时务学堂虽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但黄遵宪等人顽强地献身教育改革事业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2〕}

3. 学习西方,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黄遵宪强调向西方学习,重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他对当时中国的传统教育极为不满。在《敬告同乡诸君子》文中,他指出官立和私立学校量多质低的原因,在于“坐而不知教育之理、教育之法”,“不知所谓大中小学堂者,必须循序渐进,历级而升。今小学未开,并无小学毕业生,而遂设中学”。他们“但将旧日书馆,改题为学堂,无一定课程,无递升学级,无卒业年限,而学生又年纪参差,学业歧异,朝来而暮去,此作而彼辍,故年来官立私立学校虽多,然卒以陵节而施,欲速不达,未有尺寸之效”。

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其幼儿园“所认之字,取简易者;所读之书,取浅显明白者”。至于中小学校所设课程,计有修身、伦理、国文、算术、历史、理科、体操、图画、唱歌、手艺等科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黄遵宪十分重视理科教学。早在东渡日本之前,他便清醒地呼喊“万方今一概,莫自大中华!”给当时闭关锁国的清皇朝以极大的揶揄和讽刺。出使日本后,他亲睹异邦的声光化电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因而更深刻地批判了中国传统轻视工艺和科技的保守思想,力主学校教育必须重视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认为“实验”多,则“虚论”自少(《日本国志·天文志》)。

二、对语文教育的探索

黄遵宪在语文教育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主张散见于《日本国志》及其他诗文中。

(一) 教材的设置与改编重在实用

黄遵宪颇为重视教科书。在他看来,“非有教科书,非有师范学堂为之

〔1〕 郑子瑜.人境庐丛考[M].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59:150

〔2〕 何国华.黄遵宪的教育思想和实践[J].华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03)